

19 SHIJI ZHONGQI YILAI ZHONGGUO ZIYUANXING CHENGSHI
JINGJI FAZHAN YU SHEHUI BIANQIAN YANJIU

19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资源型城市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刘吕红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资源型城市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 项目负责人

中国
书
章

刘吕红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项目组成员

阚 敏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副教授

阚四清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英花 四川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邱 爽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

王杰伶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平
责任校对:廖 莹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研究 / 刘吕红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614-8992-5

I. ①1… II. ①刘…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②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194 号

书名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著 者	刘吕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992-5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5.25
字 数	48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环境、起点及形成	(21)
第一节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	(21)
第二节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起点和形成过程	(34)
第二章 1840—1949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	(53)
第一节 中国社会在战争与革命中急剧变迁	(53)
第二节 中国经济多元发展与城市演进	(76)
第三节 资源开发与资源型城市演进	(92)
第四节 资源型城市建设概况与空间结构	(108)
第五节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状况	(121)
第三章 1949—1956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	(138)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与制度重构	(138)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确定与城市演进	(147)
第三节 资源开发与资源型城市发展	(163)
第四节 资源型城市建设与空间布局	(175)
第五节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活	(190)
第四章 1957—1976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	(206)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演进	(206)
第二节 资源开发与资源型城市发展	(223)
第三节 资源型城市建设与空间布局	(240)
第四节 资源型城市经济与生活变迁	(257)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273)
第一节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期	(273)
第二节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理论认识	(291)
第三节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313)
结 语	(363)
参考书目	(373)

绪 论

纵观历史演进和学术研究，经济概念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扩大^①，经济发展的描述也随之趋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本书指向的“经济发展”是个广义概念，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即包含经济活动的内部要素、外部要素，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根据长时段理论，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主题是经济要素，其外延至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变化及其规律。这决定着本课题“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研究中除了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外，必然涉及社会变迁的内容，也因此形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基于经济史的角度，运用长时段理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整体展开，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进行分析和探究，由此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研究，以期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从中得出基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启示。

一、研究范围界定

本课题包含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研究层面也比较广，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对其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其重点在于回答研究指向、研究主题、研究角度等问题。

（一）研究指向是资源型城市

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表现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

^① 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的定义是不同的，远古时代的经济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存在的，现代的经济是作为影响人类世界观的一种发展形式而存在的。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2_3）统计，经济概念有工具书解释、传统政治解释、经济学著作解释、西方经济学解释等近 30 种。

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等特征,正如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所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①城市是权力和文化的集中地,美国城市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就这样说过,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集体”^②。城市也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一般来说,城市是一个区域的文明中心,列宁曾经说过:“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③

城市因人类寻求美好生活而诞生,所谓“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于城市”^④。然而,城市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生活?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说:“城市一边每日更新,一边把自己保留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形态:昨天的废物,堆在前天和更久远的废物之上。”^⑤于是,经过数千年城市的发展和数百年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向何处去”成了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话题,城市问题及相关要素也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透过学术研究动态考察,中国城市研究始于1936年李健仁撰写的《洛阳古今谈》。但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中国城市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始的。1983年古都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城市研究趋于成熟。^⑥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城市类型也作为重要内容,被纳入研究范畴。在城市研究中,资源型城市作为城市的一种类型,因其在实践中逐步陷入困境,为寻求可持续发展,对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创新提出了要求。

资源型城市的正式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30多年来,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可谓成就卓著,主要特点有:一是研究理论和方法深受西方影响。西方资源型城市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初有开创性研究,60年代以后即有了全面研究,80年代以来不断创新理论和方法。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为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二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成因及其机理、资源型城市转型、资源型区域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枯竭型城市等方面的研究。三是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研究指向与国家政策相关,尤其与国家宏观制度

① 彭力勤:《试论长时段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今日财富》,2009年第10期,第101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③ 《列宁全集》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④ 宋薇、刘兵:《城市的意义》,《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0年第3期,第55页。

⑤ [意]卡尔维诺著,张宓译:《看不见的城市》,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⑥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和政策走向密切相连，面对资源型城市急需解决的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尤其丰富。但中国资源型城市研究仍然存在局限，表现之一就是从事史的角度研究相当薄弱，到目前也未见通史成果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二）研究主题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全球关注的话题，更是中国特别要加强建设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终究要以世界发达国家为参照，要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因此，面对我国人口数量居世界之首的最大国情，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明显提高，可以说压力巨大，除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外，别无他途。为此，邓小平做出了这样的阐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②。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区域。人类的聚落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扮演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区域的增长极、文化的容器，城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城市经济对国民经济以及地区经济有明显和独特的作用。所谓城市经济，是以城市为载体和发展空间，是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高度聚集。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对城市经济问题已有认识，即所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③。

中国城市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各种城市问题，其中包括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专著和文章都不多见。截止到2013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资源中，按“资源型城市”检索，有专著352本，其中按“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检索，有专著59本，但没有一本是关于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研究的著作。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总库统计，自2000年到2013年9月，以“资源型城市”为主题的文字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③ 管仲：《管子卷一·乘马第五》，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详，第12页。

有 9393 篇,以“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文章有 4258 篇。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文章中,其中多数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文章,有 1796 篇,而鲜有关于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文章。因此,从理论上加强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是深入和丰富学术研究的需要。

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家层面已将着力点放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上,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也要看到,国家政策支撑是宏观的、指导性的,一方面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求在实践中深化对政策的理解,从而创新政策,以更有效地指导实践。已有研究表明:政策设计的理论阐释,有效的角度就是充分发挥历史功能。在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现状时可以发现:实践不能回答的许多问题往往都是因为缺乏历史经验,而认识存在误区的根源在于对资源型城市整体性、长时段了解不够,因此,实践提出了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进行整体性、长时段研究的要求。

(三) 研究基于历史角度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很多学科研究的结论,也是众多经典名家的共识。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①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这样判断:“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② 我国经济史学家高德步有这样的研究结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反映着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经济过程……经济学家们……应集中精力去发现符合历史变化的理论。”^③ 的确,历史研究可以让我们借古鉴今,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研究可以以过去的真实引导未来的发展,这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还可以给我们提供证据,储存思想,防止混淆与杂乱,尽可能还原于真实。鉴于此,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是有意义的。

中国资源型城市史研究正式开启于改革开放以后,研究首先从单体城市开始,比如有关于淄博(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1979)、景德镇(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2000)、佛山(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4)、自贡(王仁远《自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②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史分析史:第一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③ 高德步:《论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1辑,第66~73页。

城市史》，1995）、唐山（刘长锁《近代唐山工业发展与社会变迁》，2005）等城市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类型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范畴，比如《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隗瀛涛，1998）等是代表。近年来研究继续推进，出现了某一时段的整体性研究，比如《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刘吕红，2009）、《形成、发展与转型——清代社会变迁中的资源型城市》（刘吕红，2009）、《三十年社会变迁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刘吕红，2009）等。这些研究为进一步进行长时段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实证分析的基础。但不能否认，已有的研究呈现出来的确实是一些碎片，或者是局部。所谓局部的真实性不等于全部的真实性，碎片的细节性不等于历史的整体性，因此，基于局部的研究，进而展开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整体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研究理论基点

研究历史事件要将一点一点的碎片梳理成型，还要汇聚各个方面的事实及其变化，给出各个时期的历史总体格局以及各条块发展的综合趋势。“一个是综合形成的整体感，一个是通贯前后的历史脉络”^①，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又是研究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必须做的事情。将综合形成的整体感和通贯前后的历史脉络结合起来，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观及长时段理论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也因此成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研究的理论基点。

（一）以“总体史观”为基本研究立场

历史研究有“碎片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客观存在，且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比如杨天宏曾经谈道：“学者在追求对历史个案精深研究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综合性认知对于近代史著作编纂的重要性。”^②又如桑兵也曾经谈道：“本为整体学问的史学，由于史料繁多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影响，近代以来却被不断肢解，专家之学流行，读书但求为人，加上不当的学术交流与评价标准，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导致学界乱象渐深。”^③针对这种情

① 黄晓峰：《王家范谈“长时段”看历史》，见《东方早报》（上海），2011年1月30日。

② 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2～50页。

③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障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29～41页。

况，学界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① 资源型城市研究也有碎片化现象，在前面的文字中已有描述。本研究借用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克服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以总体史观为基本研究立场。

回顾史学发展历程，伏尔泰、布克哈特、博克尔、沃恩等都先后向传统史学发出过挑战，试图打破政治史的界限，尝试多元化的研究，走向总体史研究，但因其没有能够提出完整的研究框架，其理论建构也就未能完成。年鉴学派创立后，破除了传统史学的框架，将史学研究的领域从政治方面转移到经济方面，扩大到社会方面，提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地理、心理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维度，扩大了史料运用的范围。年鉴学派为史学研究开了一扇窗，成为 20 世纪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其理论代表就是总体史观。所以，总体史观不是年鉴学派发现的，但体系是由年鉴学派建立的。

第一代年鉴学派最早明确了总体史的理念，其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历史学，正如其创始人之一布洛克所说：“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②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年鉴学派的研究主体跨越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心态史的广阔领域，研究范围包括了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研究内容则包括事件、人物、制度等，研究方法则是广泛吸纳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途径与方法采取综合分析（尤其是跨学科研究）。

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继续和发展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并将其发扬光大。布罗代尔把史学研究比喻为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其特点就是由常常相互遮掩覆盖的多声部组成，且不可忽略伴音的存在和帮助。^③ 这样，史学研究的重点就从政治、军事、人物及各种事件的研究转向对地理环境、人口、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心态等问题的研究。比如，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从总体史观的思想出发，将问题意识贯穿始终，着力把 16 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1556—1598）作为整体（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地中海世界）来进行考察。其研究描述出来的

① 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②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 页。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976 页。

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整个社会的各要素（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奏出的多声部的和音展示的是一个缓缓流动的过程。

在研究中，布罗代尔把“总体史”看作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事实的总和，包含一切，所以他致力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客观范围来说明“总体史”。他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这部著作中，专门有一章来记述他对社会总体和总体史的看法。他指出：“社会是散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重新找到‘人’，而且要认出相互对立，大小不等的社会集团。”社会应该是“集合的集合”，“是我们在历史学各研究领域接触到的全部事实的总和”^①。这种认识在《地中海》一书中也有表现。在书中，布罗代尔就将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交通和城市位置）同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如物价、人口、商业、财政等），与土耳其和西班牙的争霸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传统的政治史就被置于一个多声部合奏的环境中分析，展示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因此，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使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都归入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视线。

（二）以时间尺度和结构要素为核心内容

布罗代尔在整体史研究中，将时间和结构作为两个基本要素，其中长时段是核心要素。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才能从整体上展开研究，从而把握历史的本质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出发点。在其长时段理论中，时间和结构是两个核心要素，是研究历史的两把钥匙。

1. 关于时间尺度

历史首先是时间的历史，因为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有它的时间性，没有了时间概念，历史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研究员在一次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数字表示的年代本身没有意义，但当这一数字与人们选择的某个历史事件挂钩时，这个年代就可能蕴含了意义。”^②的确，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都有源起和变迁的运动过程，从这个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感知时间的存在，可以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99～501页。

^② 俞金尧：《时间与历史学》，《文汇报》，2012年12月3日。

说,自古至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从来都不曾走出时间的范围。对此,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对历史学家来说,“时间紧贴在他们的思想上,犹如园丁的小锄总是沾土一样”^①。

勒高夫提出“历史是时间的科学”这个命题,认为历史研究的时间特征无处不在,这就是时间尺度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时间是一种工具,是历史学家对历史长河中的点滴进行挖掘、思考、判断,甚至运用的结合。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很早就在使用时间尺度来记录和研究历史,编年体就是代表之一,但直到20世纪初,人类才下意识地认识和运用时间尺度。据研究,最早注意到历史学时间尺度的是马克·布洛赫^②,对时间尺度做出完全阐释并形成体系的代表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一系列的层次,即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分布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对应的事物分布是“结构”“局势”和“事件”。布罗代尔进一步论述,“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因此,“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急匆匆的、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③。然而,有一种长期趋势,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感兴趣,这就是长时段。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在历史种种不同的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概念,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但“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④。王家范教授也持如此观点:“假若长期沉浸于相当有限的课题范围内,过于专情,久之也很容易产生偏爱甚至溺爱,表现为容易夸大所见‘树木’,忽略对‘森林’整体特征以及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的全局性考察。”^⑤

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⑥而且在这篇文字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像电波,有波长和频率。根据这个原理,其对应的是:电波的短波→短时段;电波的中波→中时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72页。

② 俞金尧:《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尺度》,《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31期,2012年7月18日。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序言。

④ 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57、119页。

⑤ 王家范:《王家范谈“长时段”看历史》,《东方早报》,2011年1月30日。

⑥ 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47~123页。

段；电波的长波→长时段。历史学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时间改变，成为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别。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布罗代尔将短时段描述为事件或政治时间，具体包括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要素，它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将中时段描述为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并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包括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要素，它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将长时段描述为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包括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它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2. 关于结构要素

布罗代尔在阐述长时段时，还提供了另一把钥匙，即“结构”。从哲学角度讲，结构就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是事物的不同类别或相同类别的不同层次按程度多少的顺序进行有机排列。将结构与历史结合，形成了结构史学。在结构史学看来，无论是总体史、经济史、社会史（包括家庭史、人口史等），还是心态史，都可以是结构史。学术界一般认为，结构主义进入史学领域与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有关，但布罗代尔的史学范型被视为结构史学的代表。

从时间尺度来阐释历史结构，这是布罗代尔不同寻常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耐久的实在。……但所有的结构全部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①。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一书中描述了公元1400—1800年世界范围内不同层面的历史面貌，而结构的描述及分析是突出的特点。在第一卷的研究中，布罗代尔叙述了构成历史基础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变化，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在第二卷的研究中，分析交易的工具、市场、生产等结构要素，其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在第三卷的研究中，论述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威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并涉及法、英等国的国内外市场及其他地区的经济特点，其题为“世界的时间”。

在结构研究中，布罗代尔认为，结构是有层次的。他在《物质文明》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400年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多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54页。

样、自给自足和墨守成规的“物质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经济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之上的资本主义活动。其中，物质生活是最基层的，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是第二层，指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等）组成的垄断经济。《物质文明》的重点是写资本主义，但布罗代尔是从最基本活动的史料来构建这段时间的特质，透过史实的陈述使人避免陷入难懂的理论深渊，体现出 15—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布罗代尔在结构的研究中，还注重解释地理环境、生态现实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物质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限制。比如，《地中海》一书中，第一章论述了地理环境，包括山川、平原、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在地中海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论述了经济环境，包括当时的国内交通状况、人口构成、工商业发展、货币流通、生活与物价、经济周期、对外贸易和战争等经济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命运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三章则描述了短时段里包含的历史的碎片，包括战争和外交等要素，在历史长河中是浪花，在多声部合唱中是伴奏，不是主流，却不可或缺。

总之，在布罗代尔看来，包含地理、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在内的各类结构支撑或阻碍着历史，且结构在融入长时段中展开研究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在他的带动下，历史学家纷纷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结构，诸如生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分析各种情势，诸如人口增减、价格波动、商业兴衰等。有学者统计，在布罗代尔的时代，《人口与社会》《人与土地》《货币、价格、局势》《港口、道路、运输》《批发与批发商》《考古与文化》《价格、工资、商业、周期》《海外贸易》等地方史、气候史、历史人口学、生态史都成为《年鉴》杂志中的热门题目。^①

三、研究框架建构

以长时段理论研究整体史，布罗代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理论也有局限，因此，本课题研究框架的建构必须是尽可能地在继承与超越中进行。

^① 程光泉：《全球化理论谱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74 页。

（一）再识布罗代尔其人及其理论

传统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它以时间为坐标，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20 世纪，欧美各有一股反传统的潮流，它要求冲破传统史学狭隘、封闭的套路。毫无疑问，在这股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史学革命运动，首推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和实践的新史学理论。年鉴学派改变了过去史学研究的狭小范围和闭塞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与深化。长时段理论的运用，使史学研究不仅容纳了包括社会调查、传统史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内的广阔丰富的历史材料，还将时间范围长、地理范围广、内容范围庞杂的历史对象十分有条理地组织在一起，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历史事物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以及在不同历史事物的作用下历史整体的发展趋向与脉络。他的长时段理论可以说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崭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

布罗代尔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法国传统史学和年鉴学派等革新传统史学的沃土上成长起来，并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创新精神建立起了自己的时段理论体系，使得总体史学在编撰思想与方法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奠定了总体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推动年鉴派史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的史学思想包涵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尤其他的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以至于很快对其他社会科学也产生了影响。

1956—1968 年，任《年鉴》杂志主编；

1949 年，当选为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

1947 年，与费佛尔、莫拉译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创办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

1956—1972 年，任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兼第六部附设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1963 年，建立了人类科学院，并任该机构行政负责人；

1984 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布罗代尔生前，有 20 几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十几个国家的科学院选他为通讯院士。美国纽约大学分校还成立了研究经济、历史体系域文

化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①

的确，在总体史观中，布罗代尔借助长时段这一概念，创新了整体史研究的工具，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当然，布罗代尔的理论不是完美的，其理论的进步与不足是并存的，这在史学理论研究中是有表现的。第一，缺乏完整的、翔实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总结出规律与法则，尤其是没有真正阐明三种历史时间及其代表的结构、局势、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环境！环境！不断地强调环境却忽略了人的作用。第三，不注重短时段的事件和当代史的研究，将其当作是历史演进中的不起眼的浪花，或不被重视的伴奏。有学者如此评价：“在布罗代尔那里，自然和地理条件与物质——经济现实一起，完全彻底地决定着人们的活动，掩盖了创作历史的主体——人。”“由于对人的忽视，对心态史、文化史和人的精神生活自然也就谈不上了。”^② 所以，布罗代尔是公认的史学巨匠，但他也有缺陷。他的巨著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顶峰。

在布罗代尔的进步与不足之间，给史学研究最大的启示之一：在运用长时段理论中，还要不停地创新与超越。所以，今天，研究者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继承与超越中，将历史研究向前推进。

（二）本研究框架的建构及简要说明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继承长时段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做点超越或创新，以建构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做简要说明。

1. 本研究时间尺度的确定

依据长时段理论，本研究也采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也就分别有了长段时间尺度的确定、中段时间尺度的确定、短段时间尺度的确定。

长时段的时间尺度为自资源型城市形成之后至今的时段。根据研究，资源型城市至迟在清初就正式形成，那么本课题研究中，对长时段的时间尺度的规定即是从 1840 年开始，包括 1840 年至今的 170 年多年的时间跨度。这个时间尺度中，中国资源型城市形成和发展是由与其紧密相关的中国自然地理、资源蕴藏、先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决定的，因此会专辟一章谈中国自然环

^① 材料来源于张芝联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32 页。

^② 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 年 7 月 26 日。